

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解释^{*}

谢作诗

摘要: 本文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探讨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的原因。本文区分了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区分了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由转轨所引致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剖析了“初始条件”观与“转轨方式”观对立的根源,指出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是一个含糊的、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结构调整中的两难困境,以及改革的不同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结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绩效。本文分析表明:工业化程度高,重工业比重重是俄罗斯经济绩效差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性质,“与转轨方式无关”。中国经济绩效好,既与工业化程度低,重工业比重不那么高有关,也与中国的增量改革方式有关。

关键词: 初始条件 转轨方式 结构调整 经济绩效

一、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

俄罗斯是实行激进式过渡的典型国家,与实行渐进式过渡的中国相比,不仅过渡方式明显不同,而且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1979-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这种增长速度只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和 20 世纪 70 年代“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出现过。而俄罗斯自 1992 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 1997 年经济略有回升,1999 年、2000 年经济较有起色以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1997 年与改革前的 1991 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 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 25%、美国 1929—1933 年大危机时期的 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 20 年。

表 1- (1)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GDP 增长率	- 14.5	- 8.7	- 12.6	- 4.0	- 4.9
通货膨胀率	2508.8	840.1	204.7	131	21.8
	1997	1998	1999	2000	
GDP 增长率	0.4	- 5.5	3.4	7.0	
通货膨胀率	14.7	84.4	36.5	11.4	

资料来源:冯舜华等(2001)。

表 1- (2) 中国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GDP 增长率	11.7	7.6	7.8	5.2	9.1	10.9	15.2
通货膨胀率	0.7	2.0	6.0	2.4	1.9	1.5	2.8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GDP 增长率	13.5	8.8	11.6	11.3	4.1	3.8	9.2
通货膨胀率	8.8	6.0	7.3	18.5	17.8	2.1	2.9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增长率	14.2	13.5	12.6	10.5	9.6	8.8	7.8
通货膨胀率	5.4	3.2	21.7	14.8	6.1	0.8	- 2.6
	1999	2000					
GDP 增长率	7.1	8.0					
通货膨胀率	- 3.0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9、2000)。

这种巨大的绩效差异使得关于中俄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而绩效差异及其原因本身就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应该说,从理论研究这个层面上来看,如何解释改革国家的这种巨大差异仍然是当今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张军,1997,9 页)。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关于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及其原因问题,经济学界从初始条件、过渡方式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我们无意也无力就所有这方面的文献作一番回顾和评论。这里的文献回顾与评论仅仅围绕本文逻辑主线而展开。

1. 初始条件

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改革之前的国情,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政策、改革路径以及经济绩效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代表人物是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 1994a, b, 1997; 世界银行, 1997)。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1978 年,中国有 71% 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只有 15% 的劳动力分布在工业部门。与此相反,前苏联在 1985 年只有 14% 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高达 32%,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俄罗斯的改革则面临(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即只能减少低效率部门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能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化改革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在中国困难得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绩效比中国差得多的原因。萨克斯和胡永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绩效好与中国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并无什么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有关(Sachs and Woo, 1994a, b; 世界银行, 1997)。

^{*} 本文得到李平老师、杨哲英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表2 中国和前苏联劳动力就业的部门分布情况(%)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业	其他
中国(1978年)	71	15	2	2	3	7
前苏联(1985年)	14	32	10	10	8	26

资料来源: Sachs and Woo, 1994a.

进一步,中国的国有部门小,而前苏联的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整个经济;国有部门又是受到补贴的。这使得在中国靠增量的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易,在前苏联靠增量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难。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仅占就业劳动力的18%,与国有企业性质接近的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也仅占5%。与此相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部门则涵盖了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1985年,前苏联93%的劳动力在国有和城市所属企业(包括国有农场)就业,6%的劳动力在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就业,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仅占1%。在前苏联,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还与国有部门并无二样,在财政上依靠国家,工人领取有保障的工资收入,享有就业保障并享受城市工人的广泛的社会福利。中国非国有部门增量上的迅速成长依赖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既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也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国有工业部门流出在增量上来发展非国有部门。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是无法移植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事实上,在萨克斯和胡永泰看来,渐进式改革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移植到俄罗斯的。“假若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去,那无异于如同让俄罗斯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Sachs and Woo, 1994a)

2. 过渡方式

用过渡方式来解释经济绩效的差异是当前理论界的主流。林毅夫等(1994)就明确指出:“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他们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指出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激进式改革正是试图提供一个能够改进激励并诱导资源存量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制度框架,但它忽略的是改革成本。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也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型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

中国的改革则是通过改进物质激励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它们配置到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抑的部门。而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做法。由于存量资源的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被配置到与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J型曲线”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他们进一步指出:既然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这些又都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转轨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有着相同的形成逻辑,因此中国的改革策略就应该具有一般意义。不应该以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否定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他们批评萨克斯和胡永泰只看到初始条件的不同使得中国增量式改革具有较低的成本,却忽略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价格扭曲更严重而可能使增量改革有更大的收益。

林毅夫等指出了增量主义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绩效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增量调整这一改革方式的极其简洁优美的逻辑。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条件下增量主义才是

可行的。

张军(1997a)就质疑:前苏联的渐进改革(1985—1989)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前苏联也曾采取增量主义的改革方式,形成了经济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并存的“两部门结构”,却没有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

张军的答案是:这是因为中国的局部改革显著地不同于前苏联的局部改革。中国的渐进改革是配额约束下的价格双轨制,而前苏联的渐进改革则是没有严格配额约束的价格双轨制。没有配额约束的双轨制,将会使资源大量流向私人部门,导致国有部门出现瓶颈和短缺,生产下降。由投入品流失所造成的国有部门的生产下降将比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更迅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有部门在改革初期占据着庞大的份额,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部门资本高度密集并且投入品之间高度互补。因此,没有配额约束的双轨制将不可避免地使过渡初期的经济经历“L型增长”。

应该说,这个问题摩菲等(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906页)是有所认识的。他们意识到要保证国有部门的生产在过渡初期能平稳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确保国有部门内部的计划配额得以执行。然而在前苏联,这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因为在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威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对在前苏联靠配额约束的价格双轨制来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信心不足,才使他们转而支持了大爆炸的改革思想。

3. 一个评论

有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为什么如此对立呢?一方认为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决定于初始条件,而与转轨方式并无什么关系;另一方又认为绩效的差异产生于转轨方式的差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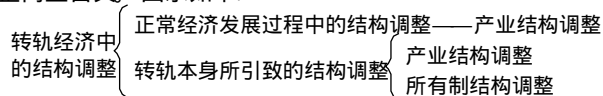
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萨克斯和胡永泰将经济绩效差异归结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俄罗斯面临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他们看到的其实是与转轨不相关的初始条件——即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导致转轨,转不转轨也都要面对这些问题。这样看问题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俄两国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但也必然得出经济绩效与转轨方式无关的结论。

林毅夫、张军等看到的则是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所有转轨国家都面临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的现实,这些又都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些导致了转轨的要求;不仅如此,转轨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具有相同的形成逻辑。这就必然使他们得出“差异产生于转轨方式,中国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一旦我们做了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和与转轨不相关的初始条件这样的分解,应该说上述的分歧和对立就是可以调和的了,就消失了。就后一类初始条件来说,你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经济绩效。你不转轨难道就不面对经典的发展问题,就不面对(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了吗?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所以,虽然经济绩效既决定于初始条件,也决定于转轨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解这种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这种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具体到结构调整问题上,双方显然都正确地认识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巨性,这种转型通常意味着结

构的调整。但是,双方都没有明确区分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和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更没有对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的确切含义给予明确的界定。本质上,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但是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显然不同于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图示如下:



就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来说,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绩效,较为完美的解释应该是萨克斯等的工作和林毅夫等的工作的结合。但即使如此,仍需要对很多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第一,为什么要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俄罗斯存在增量改革的可能性吗?如果俄罗斯不是实行激进式改革,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它的经济绩效能好到哪里去呢?为什么同样在中国,政策环境、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都相差无几,辽宁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具有明显的存量调整特征呢?第三,转轨方式确实是影响转轨经济绩效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还想做进一步的分解。就转轨的不同内容——私有化、市场化、开放——来说,它们是怎样,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经济绩效的。是市场化引起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还是私有化引起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还是开放引起国有企业利润下降?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又如何?比如,我们就很关心,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表现还不错,90年代就大面积亏损?等等。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省份较多的国家,各地区改革的初始条件也很不相同。因此,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这个一般定义的背后,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和教训(李平、陈萍,2000)。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改革背景为检验关于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各种假说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

三、一个新解释

1. 理论说明

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谈起。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林毅夫等(1994)有过精辟的论述。重工业与当时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协调,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就形成了;进一步,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呢?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并剥夺微观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既不是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

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相应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绩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所内生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

正因为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在外

部竞争的压力下,经济迟早都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根据林毅夫等人的分析逻辑,转轨国家处于比较劣势的重工业一定过度发展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了。即使以封闭的市场经济来看,也是过度发展了(谢作诗、崔万田,2002a);进一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谢作诗、崔万田,2002b)。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将引发结构调整,即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会下降。然而,结构调整是要承担成本的!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要么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于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但这样就得承担专用性资产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额的沉淀成本;要么继续维持原产业的生产,但这样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因为原产业过度发展了,并且是比较劣势产业,没有竞争优势!

可不可以避免这样的两难困境呢?如果市场化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并且重工业也不是极度地过度发展了,又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是可以避免的。就是通过增量的方式进行调整,维持存量资源不变,而将新增资源配置到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从而实现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案例也支持了这一点(张军,1997b)。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很可能与俄罗斯重工业比重过高,而且也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有关。就与转轨不相关的那一块来说,正如萨克斯和胡永泰所指出的,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综合了两方面来看,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就具有事前决定的特点,是事前决定了的。是的,如果俄罗斯能够搞增量调整的话,那么它的经济绩效会好一些。然而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如果那么。进一步,即使俄罗斯真地搞了增量调整,其经济绩效好一点,能好到哪里去呢?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就那部分不依赖于转轨方式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初始条件来说,它是极其不利的。

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这使得它可以避免存量调整的两难困境。并且就与转轨不相关的那一块来说,正如萨克斯和胡永泰所指出的,中国面对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绩效是可以好的。当然,如果中国不是搞增量调整而是搞存量调整,由于改革初期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改革初期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地下滑。因此,中国经济绩效是与转轨方式有极大关系的。

我们的结构调整显然不同于萨克斯和胡永泰的结构调整。萨克斯和胡永泰的结构调整是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严格地说是与转轨不相关的结构调整。他们看到的是两国不同性质的结构调整——中国是经典的发展问题,俄罗斯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并由此得出两国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我们的结构调整是与转轨相关的结构调整和与转轨不相关的结构调整的有机结合。我们重点讨论了由转轨所引起的结构调整,这是转轨国家共同要面对的。我们也得出了“经济绩效与转轨方式无关”的结论,但是第一,我们只是说俄罗斯经济绩效差与转轨方式无关,但却肯定中国的经济绩效好一定与转轨方式相关。这与萨克斯和胡永泰的结论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萨克斯和胡永泰那里,中国的经济绩效好也是与转轨方式无关的。第二,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曾面临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但它们并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产出下降。萨克斯和胡永泰的工作只能证明俄罗斯的经济绩效不会立刻变得更好,却不能证明其经济绩效为什么如此恶化。我们的工作对此是有所补充的。

我们所重点讨论的结构调整正是林毅夫意义上的结构调整,但我们的工作绝不是他们工作的简单重复。林毅夫等

只是讨论了与转轨相关的结构调整,只是一般地指出“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并没有进一步地分析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足够重视结构调整中的这种两难困境。他们也没有具体地分析改革的不同内容——私有化、市场化、开放——对经济绩效的相对重要性是怎样的。

我们关注为什么要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意思是,之所以进行结构调整,主要是因为转轨国家的重工业过度发展了,并且重工业处于比较劣势;之所以结构调整困难,主要是因为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确实,中国改革的绩效好,得益于其工业化程度低。但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工业化程度的高低,而是其工业的结构是否合理,其工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困难的实质不是结构调整本身,而是其工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沉淀成本的高低。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工业化程度高,只要其工业的结构是合理的,或者其工业具有比较优势,可能不会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即使俄罗斯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只要其工业资产的专用性弱,转产不会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可能结构调整就不是什么困难。

在我们看来,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在于重工业的极端过度发展,在于重工业资产的专用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额沉淀成本,而与所有制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因此,私有化程度不是决定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决定因素,更主要的决定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因素是结构扭曲的程度、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以及经济是否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

2. 经验证据

我们的分析能够得到经验的支持吗?我们的结论与事实吻合吗?

我们的分析意味着工业化程度高,重工业比重大,经济绩效就天然地差。我们的分析也意味着改革国家重工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情况是这样的吗?是的,是这样。虽然我们并没有俄罗斯的确切数据,但是中国辽宁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辽宁不仅工业化程度高,而且重工业比重大。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工业改革是极其艰难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工人下岗,大量工厂停工,与国内各省相比较,其经济地位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辽宁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极其显著的。

表 3 中国转轨前后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化(%)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第一产业	28.1	31.2	30.1	31.8	33.3	33.0	32.0
第二产业	48.2	47.4	48.5	46.4	45.0	44.6	43.3
第三产业	23.7	21.4	21.4	21.8	21.7	22.4	24.7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第一产业	28.4	27.1	26.8	25.7	25.0	27.1	24.5
第二产业	43.1	44.0	43.9	44.1	43.0	41.6	42.1
第三产业	28.5	28.9	29.3	30.2	32.0	31.3	33.4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21.8	19.9	20.2	20.5	20.4	19.1	18.4
第二产业	43.9	47.4	47.9	48.8	49.5	50.0	48.7
第三产业	34.3	32.7	31.9	30.7	30.1	30.9	32.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注: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渐进改革”在俄罗斯真的不可行吗?是的,不可行。这用不同国家的事实一般是不可检验的,因为我们无法做到“其他条件相同”。所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找到了证据。中国辽宁

不仅工业化程度高,而且其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尽管政策环境、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等,各省之间相差无几,辽宁经济改革却呈现出不同于中国一般情况的特征。如果中国改革一般地表现为渐进的特征的话,那么辽宁的工业改革更多地表现为激进的特征。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大量工人下岗,大量工厂停工,产业结构体现了存量调整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辽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所占的比重一直很小,发展一直缓慢。只是到了199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入到产权领域,特别是1997年以后,政府实施“抓大放小”方针,加大了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力度以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所有制结构也体现了存量调整的特征。

表 4 中国辽宁转轨前后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化(%)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第一产业	14.1	16.6	16.4	17.0	17.4	19.9	18.3
第二产业	71.1	67.9	68.4	65.0	63.4	60.3	61.2
第三产业	14.8	15.5	15.2	18.0	19.2	19.8	20.5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第一产业	14.4	15.3	15.2	16.1	14.1	15.9	15.1
第二产业	63.3	59.1	58.0	55.9	54.3	50.9	49.2
第三产业	22.3	25.6	26.8	28.0	31.6	35.2	35.7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3.2	13.0	13.0	14.0	15.0	13.2	13.7
第二产业	50.4	51.7	51.1	49.8	48.7	48.7	47.8
第三产业	36.4	35.3	35.9	36.2	36.3	38.1	38.5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注:三次产业的含义与同表3。

表 5 中国及中国辽宁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比例及其变化(%)						
中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8
轻工业	43.1	47.2	47.4	49.4	47.3	49.3
重工业	56.9	52.8	52.6	50.6	52.7	50.7
中国辽宁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8
轻工业	26.3	28.4	30.4	32.6	33.5	34.3
重工业	73.7	71.6	69.6	67.4	66.5	65.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表 6 辽宁工业总产值的经济类型构成及其变化(%)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国有工业	83.6	83.6	80.3	79.3	79.6	78.1	75.8
集体工业	16.4	16.4	17.9	18.8	18.5	19.7	21.4
其他工业			1.8	1.9	1.9	2.2	2.8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国有工业	73.4	72.4	71.2	69.2	68.3	68.1	72.0
集体工业	23.6	24.3	24.9	26.4	26.8	26.8	22.6
其他工业	3.0	3.3	3.8	4.4	4.9	5.1	5.4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国有工业	69.3	63.4	54.4	53.3	50.3	48.5	42.6
集体工业	24.3	25.9	28.2	29.0	29.3	25.7	18.1
其他工业	6.4	10.7	17.4	17.7	20.4	25.8	39.3

资料来源:同表4。

四、结论和启示

第一,中俄两国经济绩效的差异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初始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转轨方式方面的原因。然而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说法上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含糊不清的。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

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而转轨方式呢,它根本就不独立地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依赖于那部分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

进一步,既然渐进式改革在俄罗斯不具有可行性,这实际上是说转轨方式具有内生性。看到转轨方式具有内生性这是对的,这里事实上已经涉及到最优转轨方式的问题了。但是,严格地说,只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没有一般抽象意义上的最优(谢作诗,2000)。在这里约束条件就是初始条件。离开初始条件,是无所谓最优转轨方式的。这样的话,初始条件就是解释变量,而最优转轨方式则是被解释变量;这样的话,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否渐进式改革方式比激进式改革方式优越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第二,俄罗斯经济绩效相对较差主要是因其工业化程度高,重工业比重又过大的缘故。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性质,“与转轨方式无关”。中国经济绩效相对较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低,重工业比重不那么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

第三,转轨既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又引起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国的增量调整因为避免了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的两难困境而避免了转轨初期经济的下滑,但是,增量调整又造成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结构调整不同步的问题。就是说,当产业结构趋于均衡的时候,所有制结构还没有趋于均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增量调整最完美的是可以做到一点也不改变存量的产业性质,但是一点也不改变存量的所有制性质却绝不是一种长期均衡。增量调整所造成的所有制改革滞后很可能造成新的过度进入问题,给进一步的经济带来困难,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第四,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类似的国家,对于从事重工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其事前失败的特点。要维持原产业的生产,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要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于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又得承担高额的沉淀成本。所以,私有化就算退出了吗?私有化就算解决问题了吗?俄罗斯私有化了,但是物质、人力资本的退出,结构的调整必然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这种痛苦和长期性基本上既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是决定于转轨的方式,而是决定于重工业的比较劣势特性和重工业的高额沉淀成本特性。可以预见,越是市场化程度高,越是开放程度高,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越是面临困境。中国的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表现还不错,90年代就大面积亏损,这是否与90年代初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有关呢?

注释:

李平、陈萍(2000,101~105页)认为,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这个一般性定义的背后,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一般地表现为渐进的特征的话,那么辽宁则更多地表现为激进的特征。吴敬琏(1994)、宋承先(1995)认为,不能用渐进改革来概括中国的改革方式,相反,用激进改革或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来定义中国的改革方式似乎更为贴切。张五常则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是搞休克式的疗法,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开始是先搞政治改革,后搞经济改革。中国的成功在于先搞经济改革。然而,我们还是一般地作这样的区分,希望通过这样的区分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异,并期望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对不同改革路径的理解。

萨克斯和胡永泰的模型中只考虑了劳动力这一要素。他们认

为他们的分析同样适合于其他要素,从而得出“在俄罗斯允许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以后,即便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活动比国有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效率,也难以引起劳动力、资金和生产物资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的结论。但是,在这里劳动力和别的要素怕是不应该被同等看待的。否则的话,怎么解释前苏联1985—1989年的渐进改革的失败呢?

我们注意到用过渡方式来解释经济绩效时人们使用了很多术语,什么增量改革,什么体制外改革,什么(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等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其实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同义的反复。当然,说它们同义,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说,而是说,你要搞增量改革,必然要搞(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反过来,你搞(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又必然形成增量改革。这就是数学上的“等价”概念:有你就一定生出我,反过来有我又一定生出你。应该说,这种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更进了一层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改革的特征,并用它们来解释经济的绩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回答了这样特征的改革如何才能实现的问题。张军(1997a)应是这方面一个好的工作,虽然他的本意主要不在于解释增量改革的实现条件。

如果经济是封闭的,那么并不能说在市场经济下处于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不能生存,只是不可能得到优先发展;如果经济是开放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下处于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根本不能生存。

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明。

俄罗斯为什么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呢?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了。想要指出的是,萨克斯和胡永泰、摩菲等从不同角度所论述的“俄罗斯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其实是“不具备增量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条件”。至于这里所强调的产业结构增量调整条件,则主要与产业结构扭曲程度、资源就业情况、能不能维持贸易保护等因素有关。

参考文献:

1. 李平、陈萍,2000:《辽宁国企改革的路径分析——初始结构、竞争强度和政府干预》,载《战略与管理》,2000(5)。
2. 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2001:《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 林毅夫、蔡昉、李周,2001:《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 张军,1997a:《国有企业的亏损:对现有理论的评论和新的解释》,见《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50位经济学家论国有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5. 张军,1997b:《“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吴敬琏,1997:《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载《经济动态》,1997(9)。
7. 宋承先,1995:《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载《上海经济研究》,1995(3)。
8. 谢作诗,2000:《关于最优、次优以及理性的再思考》,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15/12)。
9. 谢作诗、崔万田,2002a:《关于比较利益论的再思考》,载《经济评论》(2)。
10. 谢作诗、崔万田,2002b:《要素价格、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见《永远的公理体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1.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
12. Murphy, K.,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1992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3. Sachs, J., and Woo, W., 1994a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14. Sachs, J., and Woo, W., 1994b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Lee C., and Reisen, H.,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ECD, Paris, France
15. Sachs, J., and Woo, W., 1997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5935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6)

(责任编辑:L)